

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与新社会价值观塑造

——以“识字课本”为中心的考察

王志强,张露丹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以“识字”为中心任务,而让人们“识什么字”“识哪些字”“如何识字”,既与人们生活需要有关,也体现着党和国家特殊的政治考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既是文化教育活动,更是新社会价值观的塑造过程。为配合扫盲,各地因地因时编制诸多即编即用的“识字课本”作为临时性教材,其内容、用途以文化教育(识字)为主,并适当结合政治教育。“识字课本”直接规定民众识字的方向和主要内容,也内在渗透着新政治意识形态构建、新社会道德培育以及新风俗习惯养成等诸多价值观层次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借助扫盲“课本”塑造新社会价值观的历史实践可为新时代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借鉴启示。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新社会价值观;识字课本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22)05-0103-08

既往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的研究,多局限于教育大众化、文化现代化视角,少数涉及扫盲运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关系^①,而关于扫盲运动与政治认同、意识形态构建的探讨,尤对扫盲与新社会价值观变革的内在关联与复杂机制的考察阙如。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既是一次文化教育活动,更是一次新社会价值观的塑造过程。譬如:在扫盲运动的多种“识字课本”中,“共产党”“新中国”“毛主席”等词句层出不穷,包括诸多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道德和风俗习惯等涉及社会价值观的因素。故此,本文试图以识字课本为中心,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对新社会价值观塑造的价值和意义,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

一、扫盲运动与“识字课本”的编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新旧社会剧烈转型,社会价值观领域出现多元复杂的混乱局面,给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和重建社会带来不利影响。那时,“大多数人因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业绩,强烈拥护党的领导,但同时也有少数的既得利益丧失者敌视新政权、敌视中国共产党,蔑视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居于两部分人之间的中间群体……对社会主义前途不信任”^[1]。与此同时,广大民众亦未能从旧社会的道德风尚和风俗习惯中突围出来,“包办婚姻、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以及会道门等旧社会的遗风恶俗还在危害着民众生活,扰乱着社会秩序”^{[2][22]}。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新的人民政

收稿日期:2022-08-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文艺中的英雄人物塑造及精神示范研究”(21CDJ029)

作者简介:王志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博士后。

张露丹,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①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马云:《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孙东升、曾璐:《20世纪50年代前期扫除文盲运动的方法和启示》,《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叶剑:《中国扫盲教育的转型研究:从工具性扫盲教育到发展性扫盲教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品:《塑造新人:建国初期农村扫盲工作的特点及经验——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基础的考察》,《理论建设》2017年第3期等。

府要领导人民“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3]1439},就必须“扫除一切封建残余,把人民群众从剥削制度和腐朽愚昧的观念中拯救出来,进而建设平等、健康社会”^{[2]22}。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扫盲。

(一)扫盲运动的开展

扫盲运动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养。由于传统文化和封建教育体制的影响,文盲在民众中所占比例极高。据统计,截至1949年,“全国小学仅有28.9万所,在校学生数2368万人,而当时6-11岁的学龄儿童约有6200万人,毛入学率为38%,实际入学率仅为20%,使绝大多数学龄儿童沦为文盲。致使新中国成立时,文盲总数高达2.9亿人,占全国总人数的80%以上”^[4]。旧社会人们饱受没有文化之苦,“打官司不会写状纸,订租约挨地主的欺骗,辛辛苦苦挣个钱,五块的当一块的花啦!”^{[5]154}可见,人民对摆脱文盲身份有强烈而迫切的需求。此外,没有文化还导致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危害人们生命财产安全。例如,在海南岛的一个生产社里,“一个月中约有十天被叫做‘忌日’,逢‘忌日’都不出工,说是下田就会碰到灾祸。村里人害怕参加合作社以后‘忌日’也要下地劳动,所以开头都不敢参加”^[6]。这严重打击了人们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又如,在舟山群岛一个叫鲁家峙的小岛上,渔民们为了祈求出海平安,“用一根烧红了的铁丝,穿透自己胳膊的皮肉,然后在铁丝上挂一盏灯;也有在铁丝上挂一面铜锣的,在集体许愿时满街敲打”^[7],这导致很多人因伤口发炎致死,最终在六百多户鲁姓家的海岛上,姓鲁的只剩四户。由此可见,由于文盲率高,封建迷信、落后愚昧思想不仅阻碍社会建设,也影响人们身心健康,长此以往必定会阻碍社会发展。因而,向广大人民普及基础教育迫在眉睫。

扫盲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在扫盲运动中,党和国家针对不同人群、不同职业形成了冬学、民校、补习班、学习组等不同形式。农民是我国人口中占比最大,且文盲率最高的群体。冬学、民校是农民的主要学习形式。冬学办学时间一般在每年秋收后到第二年春耕前的农闲时间,主要进行识字和政治教育。但由于早期冬学在机构设置、领导组织、师资经费等方面存在不足,后来逐渐被民校所取代。1951年2月,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全国各地集中精力、抓紧时间,把冬学尽快转为民校。民校一般以村、组为办学单位,统一安排学习及生产,遵

循“农闲集中学,农忙分散学,闲时多学,忙时少学或不学”^{[8]267}的原则,做到学习生产两不误。工人是我国除农民外的第二大群体。工会是组织工人学习的主要机构,通过扫盲识字班、初级班、高级班、夜校、速成中学等形式组织工人学习。截至1952年底,工会协助政府在全国建立16277所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参加学习的职工达到了308.3万人,在工人中扫除文盲53.5万人^{[9]1017}。工人接受的教育主要有生产技术知识、阶级、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等内容,还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内容。除上述形式外,党和政府也通过集中学习、分散学习、速成学校等形式对军队进行集中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下的文化教育活动,也是一次政治活动。1950年11月10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中提及:“当前一个时期,对工农干部、积极分子及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农民和生产已经正常并进行过政治启蒙教育的工人应以文化教育(首先是识字)为主要内容,并适当地结合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和卫生教育”^{[10]67}。这表明,在扫盲运动中,“识字”固然是扫盲运动的一个重点,但政治教育、技术教育、卫生教育等也是其不可分割的部分。实际上,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大多数“识字”教育的实现,都是在学习政治、技术和卫生知识相关内容的过程中进行的。有广东村志记载:“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村内以片区开办识字扫盲班……结合农村各项工作,在扫盲班增加教育宣传内容,通过讲民间故事,收集传唱农村歌谣,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同时也提高了群众政治觉悟。”^{[11]28}在宁夏回族地区扫盲运动中,由于学习内容中有很多毛泽东著作,人们纷纷传唱歌谣“毛主席著作就是好,一字一句都是宝……咱们天天勤学习,立场坚定觉悟高。”^{[12]465}可见,在“学文化”的同时,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也是扫盲的重要职能和功用。由此,扫盲运动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这一点在扫盲教材中深有体现。

(二)扫盲教材的编制

“课本”又名教材、教科书,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也是“传授知识、进行教学、培养人才的基本工具”^{[13]1}。“识字课本”虽为临时性教材,但其“课本”性质决定了其在扫盲运动中必然要发挥教学大纲、规范与考核标尺等诸多功能。在“识字”教育中,人们需要“识什么字”“识哪些字”?

这不仅由民众日常生活所需而决定,更是由‘识字运动’的组织者——党和国家的政治需要决定的。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要使扫盲运动更高效地推进,合适的扫盲教材必不可少。在扫盲运动中,党和政府早在运动开始前就对‘识字课本’的内容作出了一定要求。1950年11月,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明确扫盲运动‘以文化教育(首先是识字)为主要内容,并适当地结合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和卫生教育’^{[10]67}。之后,同年1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条件与要求、分别步骤、因地因时制宜的规定各地的扫盲课本内容^{[10]70}。尽管1954年教育部曾发出指示,要求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制的《农民识字课本》,但在具体扫盲实践中,各地也会根据实际自行编印类似课本^[14]。后来,毛泽东也指出,扫盲的课本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课本每处可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第二种课本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的加以审查,然后再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15]456}。

“识字课本”因各地有所不同,因此种类较为多样。其一是由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延伸出的速成识字课本,主要借助拼音和注音符号进行学习,见效快,半个月左右就可以认识大概1500个汉字。这类课本主要有华东工农教材编辑委员会在1952年出版的《北方音注音职工速成识字课本》《江南音注音农民速成识字课本》《江淮音注音职工速成识字课本》;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工农业业余教育司编的《职工速成识字教材》;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编的《广州音农民速成识字课本》等。该类型的课本因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推广度较高,产生的影响也较大。其二是看图识字类的课本,主要是把图片贴在常用的物品上,供学员学习。这类课本有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看图识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民看图识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图识字》,等等。这类课本把图片与实物放在一起进行学习,因此更易于人们记忆。其三是基于人们现实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类课本,例如记工识字课本、农民文化课本以及常识类教材等。就记工识字课本而言,主要有常用的社名、人名、工具名、农活名等。教育部在1956年选择了三本记工课本供各地参考使用,主要是河北省南亭乡大营村集体农业合作社的《识字课本》、河北省正定县五星农业合作社的《记工识字课本》以及山西省昔阳县

下思乐村的《记工识字课本》。农民文化课本一般来说涉及的都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破除封建迷信、婚姻法等内容。由于这类课本的内容较为丰富,所以大多都是成套出现的,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51年出版的《农民文化课本》一至四册。常识类课本主要涉及生理卫生常识、生活常识、自然科学常识等内容。这类课本有《农民写信手册》《农民卫生常识》等。还有一类是政治类的教材。这类课本主要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增强人民对于新政权的认同,进而更加自觉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这类课本主要以各个时期的具体方针政策为主,例如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0年的土地改革、1953年的过渡时期,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因扫盲课本种类繁多,有地方在一天内就编出“四百六十七本‘记工识字课本’”^[16],本文无法穷尽所有‘识字课本’,仅在兼顾不同层次和地域的基础上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课本进行分析考察。

“识字课本”的具体内容,各地也有所不同,总体上按照‘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进行编写。例如,在四川宜宾地区实行的就是三本书的策略:第一本书学习的是本村或是本乡中的一些人名、地名等,大概有三百字;之后学习的第二本书就是一些较为通用的词汇,大概有五六百字;最后学习的就是一些较为深入的知识。学习的内容是和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人民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例如在《农民识字课本》中,学习的都是农民生活中一些常用的字词,诸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五只羊、一头牛、两匹马、大鹅、一条大狗、八只小鸡’,或者是‘兄弟二人、姐姐大、妹妹小、年老的父母、男男女女学文化’等,这些都是符合农民实际需要的。扫盲教材的使用充分满足了人们的客观需要,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也因此推动了扫盲运动的发展。

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中的‘识字课本’,均为即编即用的临时性教材。但这些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因内容的独特性,使其在扫盲运动中实际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并未减弱,也因其特定政治任务之下编写和使用而对新社会价值观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政治教育与新意识形态构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动员人民群众“从事生产建设、参加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业”^{[17]6},党和政府在扫盲教材中穿插政治教育内容,推动了新政治

意识形态的塑造。“识字课本”直接规定了人们识字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内在体现了党和国家特殊的政治考量,渗透着新政治意识形态构建的诸多因素。这主要包括增强人民对党执政地位的认同、对新生政权的认同等。

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同,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治意识形态构建的应有之义。一方面,“识字课本”通过展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光辉历史,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历经艰辛、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铸就的。通过讲述党的革命历史,塑造特定历史场景展现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提高人们对党的执政地位的认同。这其中首要的是为民族国家大义而艰苦奋斗的场景布置和形象构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反抗外来侵略具有天然合法性和民众认同度。课文《过雪山、过草原》如此描述长征的过程:“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当他们经过西南大雪山的时候,大风大雪,一不小心,就会掉到万丈深的山沟里去……过了雪山就是大平原,到处都是草和泥,谁走错了路,就要掉到泥里……带的粮食吃光了,大家只能吃野菜、草根,连皮带、皮鞋也煮着吃了。”^{[18]65}在这里,课本将长征的目标设定为“为了北上抗日”,与长征途中的艰险相结合,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为“保家卫国”而经受艰险的光辉形象。同样,在《平型关大战》一文中,描绘我党领导八路军英勇抗日,取得了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大胜利的情境^{[19]91}。人们用“八路军,真英勇,开往前线平型关。四面八方埋伏好,敌人落网逃生难,漫山遍野机枪响,空中飞来手榴弹。千军万马向前攻,消灭敌人好几千”^{[19]97}的歌谣来赞美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无畏。《过长江》中写道:“进军的信号一发出,我军一面岸上开炮,一面万船齐进。船工们不管敌人的炮火,拼命地摇着船,战士们向敌人开着枪,一直向对岸冲去。”^{[18]66}这些课文通过对战争事实的描述,刻画了一幅幅英勇无畏的形象,建构起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形象的认知。无疑,这些生动场景的布置,易于使人产生移情性体验及体验性情感,让人们在学习历史中大大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同。

另一方面,课本在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故事的同时,还不断灌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等理念,引起人们的思想触动和情感共鸣。例如,《东方红》^{[20]17}、《毛主席爱人民》^{[21]35}、《藏

族歌唱毛主席》^{[19]95}等文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丰功伟绩的赞美和歌颂,不断强化着广大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鱼水之情。《共产党》中讲“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哪儿有了共产党,哪儿人民好解放”^{[22]27}、“中国有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得解放。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书念。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20]16}。这些语句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宣传,虽然采取了比较直接的“灌输”式方法,但正是通过这种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课文形式,让“毛主席”和共产党作为一种特定的形象矗立起来,在扫盲学习中形成一种互相影响和感染的“强磁场”性的氛围,从而彰显“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等思想与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把近代以来饱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加强政治教育,促使广大人民拥护这来之不易的新政权,不仅是巩固政权和恢复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政治意识形态构建的基本要求。对此,在扫盲运动中,党和政府在提高人们文化水平的同时积极进行新生人民政权的正面宣传,以增强人们对新中国的认同。首先,“识字课本”通过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展现了一个新的人民当家作主、人人生活幸福的新中国。例如《淮河两岸庆丰年》课文讲道:“淮河两岸的土地是很肥美的。可是,解放以前,反动政府不关心人民的利益,没有好好修治过淮河……农民都过着‘十年九荒’的苦日子。1950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从这以后,淮河两岸的农民不光能够防止水灾,还能够利用灌溉渠浇地。庄稼年年丰收,大家都过着幸福的生活。”^{[19]24}后来人们经常唱着:“淮河两岸鲜花开,快乐的歌声唱起来。歌唱伟大的共产党,歌唱亲爱的毛主席。领导人民治淮河,战胜多年大水灾。土地肥美收成好,幸福的日子人人爱”^{[19]27},用以歌颂共产党,赞美新中国。此外,《中国人多》^{[20]18}、《我爱北京》^{[21]46}、《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23]1}等课文,通过简短的语言从多个方面赞美新中国,激发人们对新中国的向往。其次,“识字课本”通过宣传抗美援朝战争及其英雄烈士,唤醒人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保卫”新中国。例如,《保家卫国》^{[20]25}、《志愿担架队员田老头》^{[24]43}对普通百姓的刻画,催发人们树立家国一体的荣辱感,积极参与到支援抗美援朝的洪

流中去。《志愿军英雄黄继光》^{[19]110}、《郭忠田英雄排》^{[23]90}展示了战争中舍弃生死、顽强拼搏的中国英雄形象,以强烈渲染的战争场景和军人英勇牺牲的悲壮情感唤醒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认同感,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长。此外,“识字课本”还与国家政治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宣传新国家的政策方针。面对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组织的不时破坏和武装侵扰,“识字课本”大张旗鼓地宣传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如《加强阶级斗争,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25]63}、《镇压反革命》^{[24]46}等;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25]2}、《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25]16}、《国家工业化对农民的好处》^{[19]67}等课文中对“一五计划”的详细介绍,鼓励人们拥护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在《生产要服从国家计划》^{[19]48}、《消费要服从国家计划》^{[19]48}等课文中,通过一个个互助组生产增收的生动故事,讲述人们遵循国家方针政策的意义。

三、道德教育与新社会道德建设

近代以降,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传统中国的儒家道德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西学东渐的大潮使东西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激烈交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领域仍处于新旧交替状态,社会道德层面也存在诸多混乱现象。在当时的中国,诸如“爱国”与“卖国”、“男尊女卑”与“男女平等”、“艰苦奋斗”与“骄奢淫逸”、封建迷信与尊重科学等截然对立的道德观念,一齐涌入社会民众的头脑,给新社会建设和文化转型带来困扰。对此,党和政府迫切需要进行新道德体系建设,形成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以扫盲运动中的“识字课本”为例,在全社会宣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破除封建婚姻制度、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培育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思想意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和政府构建新道德体系的重要内容,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障,同时也为在社会道德层面塑造社会价值观提供了一定助力。

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内容,也是新中国加强道德教育的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离不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在“识字课本”中,关于爱国主义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展现敌我矛盾的尖锐对立来开展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19]114}、《血债

血偿》^{[18]49}中用慷慨激昂的语句,表达出对祖国统一强烈渴望的思想,以及对反革命分子的深恶痛绝。例如,《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写道:“乌云遮盖着台湾……祖国的领土不能让美帝国主义侵占”^{[19]114-115};《血债血偿》中展现新中国将人民从压迫之下拯救:“日本鬼子在这里,你们称霸!国民党在这里,你们称霸!美国鬼子在这里,你们称霸!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再不是你们的天下了!我们从地上站起来了。”^{[18]49}此外,课本也通过鼓励人们发展生产表达爱国思想。《粮食哪里来》^{[20]32}中,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人们生活的鲜明对比,号召人们发展生产、爱新中国。通过发展生产表达爱国思想的,同时还体现在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如《最可爱的人》中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叫大家过和平幸福的日子。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我们要努力生产,支援最可爱的人。”^{[22]40}除此之外,《祖国是个好地方》^{[21]47}、《割麦》^{[21]55}、《发展重工业》^{[22]42}等很多课文,通过对人们进行爱国增产教育,不仅提高生产发展,还以“争先送出爱国粮”等形式,将人们的日常生产活动与爱国的道德标准联系在一起,通过感染、浸润等多种形式培养人们的爱国之情。与此同时,在新社会中,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运动,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逐渐联系在一起,集体主义精神也广泛传播。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互助合作道路好》^{[21]56}、《供销合作社》^{[21]79}、《信用合作社》^{[21]80}等文章,通过从生活点滴细节入手,多角度讲述合作生产给农民生活带来的益处,引导人们树立互助合作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

破除陈旧思想、推动妇女解放,成为新中国扫盲运动的重要目标。“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思想源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礼制。在扫盲运动中,为鼓励妇女学文化,一些地方专门设置托儿所解决妇女后顾之忧;还有些地方动用女社员、女干部,召开院子会、老太婆会、女社员会等,通过对比、回忆的方法进行宣传,让妇女了解受教育的好处,珍惜受教育的机会。一些识字课本对此还进行了宣传和介绍^{[26]58}。在以上活动基础上,“识字课本”在配合新《婚姻法》宣传贯彻的同时,向广大民众介绍和普及新的家庭婚姻制度,培育“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观念。如《爱华和铁山》^{[21]59}讲述了爱华的父亲想给爱华包办婚姻,嫁个有钱人;爱华却不愿意,自主选择了能吃苦耐劳的铁山订了婚,最终两个人过上幸福生活。《自由结婚》也讲述了

王家庄里的俊香姑娘,自主选择婚姻,得到全村老少夸奖的故事,“汾河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南方。李双喜和王俊香,自由结婚喜洋洋”成为当时人们纷纷讨论和传扬的佳句^{[26]18}。这些课文都以生动而精巧的故事设计,隐性表达出婚姻自由给妇女带来的影响,鼓励妇女自主选择婚姻,倡导男女平等的观念。此外,广大文艺工作者也通过创作《新娘子讲话》(年画)、《妇女代表》(戏剧)等文艺作品,配合课本中的插图,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男女平等新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同时,也在全社会倡导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道德观念。其中,“识字课本”对此进行引导和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以新的荣辱评价体系,宣传劳动在新社会是“最光荣”的。《劳动光荣》的课文,用平实的语言讲述劳动的意义:“房子是工人造的。布是工人织的。粮食是农民种的。我们吃的用的,都是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没有劳动人民,谁也不能生活”^{[20]23}。其二,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个安心农业生产知识青年》^{[19]15}中,刘卫国起先认为种地没有出息,在经过教育后思想慢慢转变,最终研究出了新的小麦种植方法,使小麦的产量每亩增加了六十多斤,成了人人争相学习的好青年。其三,劳动也没有性别之分。《劳动模范李春华》^{[19]14}讲述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如何带领合作社种好庄稼、获得好收成的故事。此外,识字课本还重点传播生产劳动中工农团结的思想,提出工人和农民都是我国的主要劳动力,只有把工农团结在一起,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出力。这些在《工农是兄弟》^{[21]42}、《棉花进城布下乡》^{[21]43}、《工农团结》^{[20]24}、《工农联欢大会》^{[19]75}等课文中均有所体现。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把艰苦奋斗精神同群众的生产发展联系起来,对农民进行党的最新方针政策的教育,如《人的力量胜过天》^{[21]45}中讲的“不求神、不靠天,大家靠自己打井、挑水、锄地来把农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对人们进行政治教育,使其明确自身担负着建设国家的重任。如《艰苦奋斗,保证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25]9}中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为国家建设尽心尽力。在《把铁路修到祖国的边疆》^{[19]69}中,描述了工人们面对施工困难巨大的铁路修建时,毫不退缩,不分日夜地开山、开沟、架桥、挖山洞,终于把铁路建好了。通过这些课文的讲述,让人们看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观念得到广

泛宣传和树立,一种“劳动光荣”“好逸恶劳可耻”的新型道德观念在新社会得以培育与生长。

四、移风易俗与新风俗习惯养成

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礼节和习性。因其对人们的思想和言行起教育、规范和引导等作用,长期以来被历代统治者和社会精英视为治国兴政的必要手段。治国者常言“为政必先究风俗”,史书亦曰:“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乃纪纲”,“不可一旦而无焉”。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国各地风俗既丰富又复杂,有反映人们生活风貌的良好习惯,也不可避免存在对人们思想和活动进行束缚、禁锢甚至有害的内容。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27]645-646}。新中国成立后,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伤风败俗的社会丑恶现象仍然存在,封建迷信、包办买卖婚姻、铺张浪费等旧风陋习仍然在民间流行。解决这些问题,是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扫盲运动就是推动移风易俗的重要举措。

在扫盲运动中,“识字课本”培育新风俗习惯,主要体现在提倡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以及破除封建迷信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旧社会,由于人们卫生意识差,致使“国家的卫生状况极端恶劣,病媒虫兽严重为害,疾病丛生,疫病横行”^{[28]8},许多人被夺去生命。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人们身体健康、社会正常发展,党和国家把卫生医疗工作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卫生教育课程也成了扫盲运动中的一项重要课程。在“识字课本”中,《为什么要讲个人卫生》^{[29]4}、《公共卫生》^{[18]58}、《讲卫生》^{[21]84}、《怎样预防疾病》^{[26]15}等文章中,都对卫生问题的重要性作出回答,鼓励人们爱护环境,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减少疾病传播。其中明确提出,讲卫生不仅是为了个人身心健康,也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除了号召人们讲卫生外,扫盲教材中还普及了一些卫生常识。《怎样剪脐带》^{[18]61}中正确剪脐带方法的图文普及,避免了小孩一出生就得脐风的命运;《怎样看护病人》^{[19]41}中详细地讲解了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病毒传播,最大程度地保护病人和家属健康。类似的文章还有《小孩假死的救治法》^{[18]62}、

《人为什么要喝水》^{[24]51}等。这些卫生知识的普及教育,不仅有利于改变人们以往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传统中国是一个封建统治历史达上千年,封建迷信也存在和流传上千年的农业国家。这些迷信活动不仅麻痹人的精神,危害人的身体(如患病不求医而求鬼神),更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要推动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必须从根源上消除封建迷信思想,对人们进行科学教育。在“识字课本”中,对人们进行科学教育,首先体现在正确认识一些常见自然现象的普及上。《雷和电》中讲打雷闪电不是雷公电母在发怒,而是云中阴电和阳电相互碰撞的结果^{[19]56};《月食》不是天狗食月,而是照到月亮上的太阳光被地球挡住发生的^{[19]61};《风》也不是什么鬼怪在作乱,而是地面上空气遇热的结果^{[24]59}。诸如此类知识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对自然的盲目恐惧,提高了科学认识。同时,课本通过巧妙的故事设计来破除封建迷信的行为。《一个大红枣》讲述了青年团员张立明用妙计破解神婆鬼话,让自己母亲看清鬼神的故事^{[19]39}。《李美花的死》^{[18]59}则讲述了母亲听信神婆装神弄鬼的胡话,最终害死自己孩子的故事。《河神娶亲》^{[23]57}一文反映出,因旧社会人们的愚昧无知,错把发洪水认为是河神在发怒,再加上神婆的胡言乱语,使人们把不知多少人家的好姑娘都葬送在了河底。类似的封建迷信行为,轻则拿人钱财,重则害人性命,给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通过这些识字课本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封建迷信的思想和行为,引导人们树立相信科学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而且还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

五、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推进新社会价值观塑造的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在国家经济恢复、政治建设、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扫盲运动最直接的成果是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识字水平。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所兼具的政治教育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促进了社会价值观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道德和风气习俗方面的塑造。在这场运动中,人们“发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从而掌握了话语权和先进文明的可能,并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促进农民对新生国家的认同”^{[30]84},从而普遍接受党

的领导、拥护新生政权、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与此同时,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在人们心中广为树立,男女平等思想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热爱劳动、艰苦奋斗思想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干净卫生的生活方式、相信科学的价值取向使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进入新时代,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成功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研究“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特点”,通过满足人们实际需求来实现思想教育^[31]。对于尚未树立一定社会价值观的普通民众而言,利益的满足是实现其政治认同的根本动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扫盲运动的“识字课本”编制中,一个基本理念是教育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从“记工”“记账”开始,人们缺乏什么就教育什么。在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性的政治教育,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果。进入新时代,面对多元价值的广泛存在,我们要深入研究“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特点”,“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32]579},通过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进行思想教育。关注新时代特定人群的情感需求,加强相应的情感供给与情感力量支持,在以情动人的过程中进行价值引领。

第二,借助特定活动中“课本”等多样化的媒介工具,进行隐性的引导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扫盲运动中,除了采用“课本”媒介之外,还运用黑板报、顺口溜、标语、话剧、歌曲等丰富多样的媒介工具,在激发人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加强隐性的引导教育。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也必须借助多样化媒介工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隐性传播和弘扬。要充分发挥仪式作用,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进一步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注重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种教育媒介,关注当代青年人喜爱的“B站”“抖音”“表白墙”等非传统媒介,提高人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积极运用大数据手段,及时对引导过程中的变化及效果进行跟踪了解,不断调整和创新方式方法,提升教育成效等。

第三,将意识形态教育与道德建设、移风易俗工作相结合,协同推动核心价值观培育。意识形态与道德、风俗均属上层建筑范畴,均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与道德、风俗具有同根源的属性,因而内在地具有紧密而天然的联系。进入新时代,要将抽象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具体化生活化生动化,与人们生活中的“善恶”“美丑”等道

德观念结合起来,与人们生活中的新风尚新习俗联系起来,在进行社会道德建设和移风易俗的工作中渗透意识形态教育。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开发创作一系列贯穿意识形态教育与道德建设、移风易俗等多项工作的文化精品力作,形成多种形式的“正能量”产品集群。加强社会和网络的正向氛围营造,构建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也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又风清气正的“网上网下同心圆”。

不必讳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中,由于“识字课本”渗透着诸多政治教育和社会价值观的因素,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意识形态性偏差、与群众生活不适应、群众积极性受到一定挫伤等问题。但总的来说,扫盲运动既通过文化教育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更在新中国政权巩固、社会重建背景下为新社会价值观塑造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为新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政治秩序和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继而为推进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在特定历史场景中,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的结合,既为形势所需,也在客观上助推了当时的文化转型与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 [1]王先俊.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3).
- [2]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
-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的扫盲教育[J].教育研究,1997(6).
- [5]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 [6]季音.五指山上的一朵鲜花[N].人民日报,1956-12-16.
- [7]全一毛.海上故事的变迁[N].人民日报,1956-12-07.
-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辉煌的篇章——中国“两基”工作纪实[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9]钟明.中国工运大典(下)[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 [10]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 [11]陈汉初.沟南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 [12]刘来兵,涂怀京,但昭彬.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第8卷(中华人民共和国)[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7.
- [13]董少英.高校教材建设与教材管理[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3.
- [14]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J].安徽史学,2013(4).
- [15]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6]新华社.三千多万农村青年将学文化[N].人民日报,1955-12-28.
-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工农教育司,1979.
- [18]徐勉一,张星五.农民识字课本(第二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
- [19]农民识字课本(第二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
- [20]农民识字课本(第一、二册合订本)[M].大连:大连图书供应社刊印,年代不详.
- [21]农民识字课本(第一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 [22]鲍永瑞,张星五.农民识字课本(第一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 [23]张星五,张田若.农民识字课本(第三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
- [24]徐勉一,张星五.农民识字课本(第三、四册合订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
- [25]农民业余学校政治课本[M].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
- [26]山西省教育厅.农民识字课本(第三本)[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6.
-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8]健康报编辑部.十年来卫生事业的辉煌成就[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 [29]花新人.农民卫生常识[M].武汉:群益堂出版社,1956.
- [30]叶国文.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3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强调 鼓励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N].人民日报,2014-12-3.
-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吴爱军]